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伊斯蘭教真的被「妖魔化」了嗎？—一個整合既有經驗發現的論點

Is Islam demonized? An Integrated Argument from Empirical Findings

doi:10.30390/ISC.200207_41(4).0002

問題與研究, 41(4), 2002

Issues & Studies, 41(4), 2002

作者/Author : 黃旻華(Min-Hua Huang)

頁數/Page : 21-4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伊斯蘭教真的被「妖魔化」了嗎？^①

——一個整合既有經驗發現的論點

黃 昊 華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911 事件後，「伊斯蘭教是否被妖魔化」又成為美國政治學界的熱門議題。過去學界的辯論總停留在理論層次而流於空泛，經驗上有助於釐清辯論的文獻，不但數量少，多侷限於特定時空環境。本文試圖整合既有的經驗發現，並提出一個整合性的論點，初步結論是：「伊斯蘭信仰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和「愛好和平」皆呈負相關。前者與「低教育程度」和「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有關，後者與系統層次因素有關，兩者皆非單純宗教因素，但與宗教相關。

關鍵詞：伊斯蘭教、中東政治、宗教與政治、政治學方法論

* * *

註① 在本文中，「妖魔化」所指涉的是某一事物與某些負面價值所具有的相關性，換言之，事物存在的本身不具有價值，而是人賦予事物價值判斷。因此「伊斯蘭教是否被妖魔化」作為一個命題，語義上是將伊斯蘭教假定為本質上不具有價值的事物，來探究信仰伊斯蘭教的虔誠度，以及對於伊斯蘭政治主張的支持度，在個人層次上，是否與西方社會所認知的「支持民主」和「支持和平手段解決以巴問題」兩正面價值具有反向的共變關係。儘管如此，作者承認所謂「負面價值」是相對的，西方所認知的正面價值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來說不見得是正面的，特別就長久以來與西方不斷有緊張關係的中東國家而言，「民主」和「以巴問題」在其社會脈絡中所被理解的內涵和意義，往往與西方國家差距甚大，所以特別提醒讀者，本文對於道德上，究竟「支持民主」和「支持和平手段解決以巴問題」的態度是不是具有普世正面價值的問題，是採開放的態度，但在論述上則將西方的認知觀點作為本文的工作假設(working assumptions)，理由在於本文所討論和引註的文獻都是出自美國學界，而美國學界對於此工作假設的合理性基本上是無庸置疑的，因此這裏是為了討論之便而沿用，並非代表作者的個人立場。

壹、前　言

911事件的發生，美國各界的反應一致是相當憤怒但謹慎，這不僅反應出長久以來美國政府在中東問題上的矛盾立場，同時也反映出美國國內族裔和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大體而言，官方的態度是將911定位成恐怖主義對美的侵略，因此敵人是所謂的「恐怖份子」，而非特定國家、宗教或族裔，試圖將「反恐戰爭」與其他敏感的國際國內問題脫鉤，來減少其執行戰爭行為上的阻力。民間的態度，儘管各媒體都一再強調伊斯蘭教不能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並且呼籲美國民眾不分族裔、宗教和黨派，都應該團結一致，防止有心人士在國內煽動種族和宗教的紛爭，但一般人民不免對於伊斯蘭教和阿裔人士投以異樣的眼光。學界的態度則一反常態的低調，不但類似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②(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之論調鮮少出現，大部分的學者都反對將伊斯蘭教描繪成具有「妖魔特質」的信仰，強調此事為單一事件，與宗教、種族，甚至與國際外交政策都不相關，純粹是少數激進的極端份子假借伊斯蘭名義所進行的恐怖活動。總而言之，不管各方真正的觀點和立場為何，呈現給外界的印象是美國極欲撇清911與伊斯蘭教和中東問題的任何關連，並且防止其引發進一步的內政問題。

從發動軍事行動的角度上來說，上述反應都不難理解。但進一步來看，當所有官方言論都指稱「恐怖份子」包括阿富汗「塔里班」(Taliban)政權、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個人和「蓋達」(Al Qaeda)組織，當所有參與劫機的嫌犯都是阿拉伯裔人士，當「塔里班」政權和賓拉登皆試圖以伊斯蘭之名向美國發動聖戰，並得到許多穆斯林支持的同時，如果僅因政治敏感度過高，來排除宗教和政治的任何關連，不但推論顯得過於薄弱，同時證據也同樣不足。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治學是一門科學的前題成立的話，那麼政治正確並不能增加我們對於這個命題真實性的了解。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試圖從既有的經驗研究成果來尋找可能的答案。儘管過去美國學界對此命題已有相當多的辯論，但多半停留在理論層次，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持或否證，使得因果關係無法得到釐清，也限制了進一步發展理論內涵的基礎。^③在下面的討論中，首先將針對方法論的議題和相關經驗研究進行文獻回顧，其次是討論「伊斯蘭

註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註③ 關於伊斯蘭是否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傳統具有必然的衝突，以及本質上是否具有好戰的傾向，除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一書外，還可參考下列文獻：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John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le F. Eickelman and James Piscatori,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R. Stephen Humphreys, *Between Memory and Desire: The Middle East in a Troubled Ag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教是否被妖魔化」此命題在邏輯上的三個矛盾之處，然後本文將提出一個整合性的論點，最後則是結論。

貳、方法論及文獻回顧^④

嚴格來說，「伊斯蘭教是否被妖魔化」作為一個命題（以下簡稱「妖魔化」命題）語義並不明確，過去學者在研究此議題時，最常用的自變數是「個人的伊斯蘭宗教信仰虔誠度」（以下簡稱「個人虔誠度」，personal piety）和「個人對伊斯蘭政治主張的支持度」（以下簡稱「政治化宗教虔誠度」，political religiosity），^⑤而依變數則是「支持民主的傾向」（以下簡稱「支持民主」）和「對以巴問題支持以和平手段解決的傾向」（以下簡稱「愛好和平」）。如果以統計方法控制其它相關變數，在多變量迴歸模型中，只要「個人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和「愛好和平」出現顯著的負相關，那麼這是支持「妖魔化」命題最強的經驗證據；如果是「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而非「個人虔誠度」與兩依變數呈顯著負相關，則「妖魔化」命題的成立可以被政治動員所解釋，也就代表間接的被否證，或者至少是削弱；如果是其它的結果的話，那麼「妖魔化」命題就明確地遭到否證，因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斯蘭教作為宗教本身或政治動員的工具會產生偏好戰爭或反對民主的負面現象。

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層次上，上述研究設計的邏輯是相當清楚的。就自變數來說，許多學者指出，穆斯林在理解伊斯蘭教義時，如果單就宗教而論，或者是賦與政治性詮釋，其結果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個人虔誠度」高不代表「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就高；相同地，「個人虔誠度」低也不代表「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就低。^⑥所以某人可能本身相當虔誠，但並不認同以伊斯蘭名義來進行政治動員，而亦可能其本身並不虔誠，但卻認同伊斯蘭教是適合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關於區分何種態度是構成「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這必須由研究者所依據的理論基礎來決定，但一旦決定後，技術上則可以對於調查資料進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來確認。^⑦

註④ 本文的重點在於實證研究的文獻探討，因此下面所針對的，都是中東政治領域中偏向個人層次的民意調查研究。

註⑤ 在概念上，「個人虔誠度」是宗教上的信仰虔誠度，「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是在政治上對於伊斯蘭政治主張（political Islam）的支持度，兩者已預設了伊斯蘭信仰在宗教和政治層面是可以分開的。Mark Tessler and Marilyn Grobschmidt,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5~169.

註⑥ 同註⑤，p. 154.

註⑦ 因素分析法並不能解決何種態度是構成「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的問題，而只能就既有的假設來作驗證，以增強我們對於假設的信心。關於因素分析法的方法論問題，本文在第三節的「解釋二」中有詳細的討論，更深入的部分，請參閱 Jae-On Kim and Charles W. Mueller, *Introduction to Factor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 (Beverly Hills: Sage, 1978); Jae-On Kim and Charles W. Mueller, *Factor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Practical Issues* (Beverly Hills: Sage, 1978).

就因變數而言，關鍵在於到底什麼樣的概念適合作為「妖魔特質」的指標。^⑧在目前的中東政治和國際關係領域中，「以巴問題」和「民主和平」分別是最為重要的議題，就前者而言，當前中東人民是否支持以和平手段解決「以巴問題」的態度，直接關乎中東的戰爭與和平；至於後者，「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的命題幾乎已成為國際學界公認最為堅實的發現，如果中東人民都支持民主，那麼可推論的是未來面對「以巴問題」的態度上，應該也會傾向支持和平的手段來解決，並且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態度也會比較友好。^⑨總而言之，「支持民主」和「愛好和平」正是相對於「妖魔特質」的概念，如果自變數與因變數的關係都是顯著的正向相關，那麼「妖魔化」命題就不成立，如果自變數和因變數出現有負向相關的現象，其關係的判定就如本節第一段所述。

此外由於伊斯蘭教中諸多對於女性權利的限制，加上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中「女性主義」學派的興起，使得伊斯蘭教是否與女性主義在本質上具有衝突，以及女性穆斯林是否比男性穆斯林愛好和平等議題，都受到國際學者的關切。^⑩廣義來說，如果「女性主義」學派的論點是正確的話，那麼兩性在「支持民主」和「愛好和平」態度上應該會有顯著的差異，同時如果認為性別因素的作用並非是生物性的定義（如 biological sex），而是比方說像「男女平權」（gender equality）的態度，也可以經由因素分析法來將其納入統計檢證的模型中。^⑪

以此概念架構進行研究的，Mark Tessler是最為資深且多產的中東研究專家，在近年來，他陸續在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等期刊中發表第一手的調查資料及其統計分析，所獲得的經驗研究發現可整理如下：（詳細的資料說明和出處如附錄一和附錄二）^⑫

註⑧ 同註⑤，pp. 143~148.

註⑨ 嚴格來說，這個推論犯了「個體論的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acy)，也就是說從個人層次特質的加總（每個人都傾向支持民主），來推論系統層次的特質必然發生（民主國家不打仗）。因為民主國家打不打仗，不單純取決於國內民眾認不認同民主，而是一個國家的安全決策，關乎其它系統層次因素，如軍事實力，國際結盟關係或國內政經情勢等。因此這裏強調的，不在於嚴謹的推論，而是民主價值對於促進世界和平的期許。關於民主和平命題，參閱黃曼華，「『民主和平』研究的方法論：『聽眾成本』概念之辨析」，問題與研究（台北木柵），第40卷第1期，民國90年1、2月，頁87~107。

註⑩ Mark Tessler and Ina Warriner,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rvey Data from the Middle East,"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 1997), pp. 250~281;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udra Grant, "Further Tests of the Women and Peace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 1999), pp. 519~531.

註⑪ Mark Tessler and Ina Warriner,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rvey Data from the Middle East," p. 271.

註⑫ 在美國政治學界，並沒有太多中東地區民意調查研究的發表，而真正有系統性的在理論上有所著墨，除了Mark Tessler之外，幾乎是沒有。不過巴勒斯坦政治學者 Khalil Shikaki，以及黎巴嫩政治學者 Hilal Khashan 做過許多中東地區的民意調查研究，並發表在「巴勒斯坦公共政策及調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網站上，網址是 <http://www.pcpsr.org/index.html>。

發現一：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上沒有顯著差異。^⑬

發現二：「個人虔誠度高」和「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是最能解釋為何具有高「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此發現同樣適用於男性和女性。^⑭

發現三：「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越高者，「支持民主」的態度越低。

發現四：男性與女性在「愛好和平」的態度沒有差別。

發現五：「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而非「個人虔誠度」，與「愛好和平」的態度呈顯著的負相關。

發現六：若不區分「個人虔誠度」或「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而以「宗教虔誠度」（*Islamic religiosity*）涵蓋兩者，具有「較低宗教虔誠度」者比具有「較高宗教虔誠度」者有較高「愛好和平」態度的傾向。

發現七：在部分的中東國家中，女性的「個人虔誠度」和「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的特質與「支持民主」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而在男性中，沒有這樣的相關性。此外，相同研究顯示，「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的特質與「支持民主」並不具有顯著的負相關。^⑮

發現八：具有高「個人虔誠度」的人，並不會比具有低「個人虔誠度」人更不「支持民主」。（其中「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此一變數有受到統計控制）

發現九：「教育程度的提高」與「支持民主」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發現十：「教育程度的提高」與「愛好和平」並不顯著相關。

特別說明的是，上面對於既有文獻研究成果的整理，都是將其結論一般化，並非僅就其研究所屬的特定時空環境而論，目的在提供本文論述「妖魔化」命題的基礎，而非刻意扭曲原有研究成果。^⑯

參、三個邏輯上的矛盾

基於將應用上的限制謹記在心的前提下，上節所列的十項研究發現是可以對釐清「妖魔化」命題有所助益的；特別強調的是，上面的發現或許有時空上外延性（*extrapolation*）

註⑬ 「政治化宗教虔誠度」（political religiosity）在穆斯林社會中所指的就是「對於伊斯蘭政治主張的支持度」（political Islam），兩者在本文中是同義的，可交互使用。

註⑭ 發現二所述，是指有兩項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穆斯林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一是「個人虔誠度」（personal piety），一是「對政府的負面態度」（negative view of the government）。在下面的討論中，作者假設這兩點可以二分且窮盡穆斯林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動機。

註⑮ 發現七所述，是指就內涵來說，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有兩種不同形態的支持者。一種是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Islamic guidance i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另一種是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Islamic guidance in economics and commerce*）。也就是說，兩人可能同樣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但其所認同的「伊斯蘭政治主張」在內涵上並不盡然相同。在下面的討論中，作者假設這兩種典型可以二分且窮盡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支持者。

註⑯ 作者並不認為上述十項發現都必然為真，事實上每項發現的效度並不盡然一致，並且其結論在邏輯上亦可能相互矛盾。儘管如此，作者的確假設這十項發現為一封閉系統，並且試就其中所產生的矛盾之處提出可能的解釋，來提一個整合性的論點。

的問題，並且問卷的題目和執行的研究人員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接下來所討論在邏輯上的問題，只具有啓發性價值，並且侷現在理論層次，目的在於釐清「妖魔化」命題的因果關係。

矛盾一：推論一和推論二互相抵觸

推論一

如果兩性在「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⑯上沒有顯著差異（發現一），而相同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應該具有相同的「支持民主」態度（發現三），那麼兩性在支持民主的態度傾向上應該沒有差異。

推論二

如果兩性在「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上沒有顯著差異（發現一），但女性中「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的特質與「支持民主」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而男性中沒有這樣的相關性（發現七），那麼女性對於民主的支持應小於男性。^⑰

解釋一

根據發現二，「個人虔誠度高」和「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是最能解釋為何具有高「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因此女性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可能較多是來自「對政府的負面態度」，而男性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可能較多是來自「個人虔誠度」。如此一來，基於下面兩點，矛盾一可以合理的被解釋：

一、推論一所依據的，是未進一步區分在支持者動機和典型下，兩性在「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上是否有不同偏重的研究結論，因此僅就「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而論，並不能辨別男女兩性所支持的伊斯蘭政治主張是不是屬同一面向的。比方說，男性所支持的伊斯蘭政治主張可能是關於「國家伊斯蘭化」（state Islamization），但女性可能支持的是經濟生活的改善，所以儘管兩性所理解和支持的伊斯蘭政治主張有所不同，但因為在政治動員時，男女所關切的議題都被包含在伊斯蘭政治主張中，並且都具有說服力，因此實際上推論一中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對男女來說其內涵是不同的。^⑱

二、從推論二引申，如果男性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偏重在「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並且較多來自「個人虔誠度」，根據發現八，因為「個人虔誠度」並不影響「支持民主」的態度，所以女性對於民主的支持度小於男性之推論是合理的。^⑲

註⑯ 所謂「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是指在不區分支持者的動機（「個人虔誠」或「對政府的負面態度」），以及不區分支持者的典型（「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或「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之下，在某一群體中（男性，女性，或全體人民）中，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者所占的比例。

註⑰ 論證如附錄三。

註⑱ Mark Tessl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Orientations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Four Arab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forthcoming).

註⑲ 稍後將會說明，男性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女性在伊斯蘭社會中的所被賦予的角色地位，都是支持這個推論的理由。

矛盾二：推論三和推論四互相抵觸

推論三

根據發現一和發現五，男性和女性在「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上沒有顯著差異，而且「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愛好和平」的態度呈顯著的負相關，因此男性和女性在「愛好和平」的態度應該也沒有顯著差異，這與發現四吻合。

推論四

從解釋一和發現五來看，如果男性和女性「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沒有差異，但男性出自「個人虔誠度」而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比女性來得多，而「個人虔誠度」又與「愛好和平」的態度不相關，那麼男性應該比女性更愛好和平，因為這些因「個人虔誠度」而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男性，將不會有顯著的反對和平態度顯現。^②

解釋二

如果「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作為多變量迴歸模型中兩高度相關的自變數（此時因變數是「愛好和平」），即此模型具有「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③則發現五的效度令人質疑，其結論並不適合直接用來推論。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的解釋並非是要單純將推論三和推論四都推翻，使矛盾二不存在，而是要更深層的來看到底「線性重合」可能存在的理由為何？如果這樣的質疑是合理的話，如何重新詮釋發現五？又如何解釋矛盾二？

要回答上述三個問題，必須回到發現五的原文上來討論其研究方法。^④首先針對「線性重合」可能存在的理由，主要是因素分析法在方法論上問題，以及「個人虔誠度」與「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在概念化、操作化和測量上的問題。

因素分析法的主要功用，在於找出可以被已知的潛藏共同因子所解釋的變數，但

^{註②} 比如說，男性和女性各有 40 % 的人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但男性在這 40 % 中，有 30 % 是因「個人虔誠度」而來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只有 10 % 是因「對政府負面態度」而來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在女性中則相反，有 30 % 是因「對政府負面態度」而來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只有 10 % 是因「個人虔誠度」而來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倘若發現五是正確的，那麼並不是所有的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人都會與「愛好和平」呈負相關，而是只有因「對政府負面態度」而來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人（不區分其支持者典型，但區分支持的原因），才會有較低的「愛好和平」傾向。也就是說，儘管男女兩性都各有相同比例的人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但真正有較低「愛好和平」態度的人，男性只有 10 %，而女性卻有 30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other things being equal），男性應比女性愛好和平，這點與推論三相矛盾。

^{註③} 「線性重合」不見得完全是因資料或統計上的問題所造成的，有可能是因為理論上對於概念本身的界定就發生問題，導致一自變數本身可由其它自變數的線性組合來表示。如果是前者的問題，可多增加調查資料的樣本數來彌補，或者利用統計方法來解決；但對於後者，則就不是任何統計技巧所能幫得上忙的，必須重新回到理論的層次，重新對於概念化、操作化和測量部分的工作來進行修正。參閱 William H.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0), pp. 255~259.

^{註④} Mark Tessler and Jodi Nachtwey, "Isla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5 (Oct 1998), pp. 619~636.

其限制在於一、必須要先有足夠的理論基礎支持潛藏共同因子的存在；二、即便在潛藏共同因子已知的情況下，仍可能發生同一因徑模型具有多組不同的因徑係數（factor loadings），或者是多組因徑模型皆符合可能的因果關係推論之問題。^②更棘手的是，加上操作化、抽樣、測量上所可能產生的誤差，因素分析法只能增強研究者對於既有理論假設的信心，而不能排除其他相對應的理論存在。^③在 Tessler 和 Nachtwey 的原文中，儘管他們已經細心地對部分問題作出說明，但關鍵仍出在問卷設計上，到底何種調查項目是屬於「個人虔誠度」，又何種問題是屬於「政治化宗教虔誠度」這兩個潛藏共同因子的問題上；而其說明並不能排除在理論層次上和被調查對象之間對於「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存在著理解上的很大的差距。比如說，Tessler 和 Nachtwey 將「你是否同意或不同意宗教和政治必須分開」和「你是否認為宗教的覺醒正在當今的社會裏發生」兩項調查項目列在「政治化宗教虔誠度」類別中。但這兩個問題在伊斯蘭信仰系統中，可能並不符合「政治化」的定義，因為伊斯蘭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秩序，上述問題並不特別「政治化」。^④將這兩個項目列為「政治化宗教虔誠度」之類別，不但可能過度縮小「個人虔誠度」類別的範圍（同意政教事務不應分開或宗教覺醒正在發生難道不代表某種個人的宗教觀？），事實上也使我們無法真正測量到理論上所謂「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的概念。^⑤至於因素分析法的方法論缺點，則更增加問題的複雜性，因為如果將上述所列的兩調查項目改列或並列於「個人虔誠度」類別中，同樣也可找出不只一組因徑係數符合這樣的分類，如此一來，所有的統計結果勢必完全不同，所以在上述根本問題未解決前，單就統計結果來論「線性重合」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儘管如此，本文並不主張完全推翻發現五的結論，而是認為在詮釋上必須加註下列兩點但書：一、發現五過度低估「個人虔誠度」與「愛好和平」的負向關係，而高估「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愛好和平」的負向關係。二、詮釋發現五時，應將「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視為包含許多「個人虔誠度」元素的一自變數；換句話說，「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都與「愛好和平」態度具有的負向關係，^⑥惟前者

註② 如果發生多組因徑係數符合同一因徑模型的問題（潛在共同因子多於一個，則此問題在理論上必然會發生），即為所謂的「坐標軸的旋轉問題」(problem of rotation)。一般而言，在統計上學界的共識是「簡約原則」，也就是可以用較簡單的因果關係假設達到相同解釋力，就採簡單的假設。如果是多組因徑模型都符合在理論上的因果推論時，則此問題超出因徑模型處理的範圍，需要研究者對於現象本質的了解來克服。Jae-On Kim and Charles W. Mueller, *Introduction to Factor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 pp. 38~46.

註③ 同註②, p. 45.

註④ 同註②, p. 629.

註⑤ 因此問題又回到：到底在伊斯蘭信仰中什麼是屬於純粹宗教的部分，什麼是政治化的部分？對此，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來處理，一是必須進入伊斯蘭文化中理解其宗教和政治分野的所在，但這會耗費研究者極大的時間和精力融入當地文化，另一則是採用客觀的一般化指標來處理，但這並無助於根本問題的解決，並且研究者在整個思考基模 (schemas) 上可能會發生典範轉移失真的問題。

註⑥ 這一點與發現六相呼應。

的負相關程度較後者為低。因此針對矛盾二來說，如果概念上伊斯蘭教是可以分得清所謂「宗教的」和「政治的」界線，那麼推論三並沒有基本的錯誤。至於推論四，由於其推論基礎建立在發現五中「個人虔誠度」和「愛好和平」不相關的結論部分，因此是個錯誤的推論，矛盾二並不存在。

矛盾三：推論五和發現八互相抵觸

推論五

根據解釋二和發現三，當「個人虔誠度」與「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具有「線性重合」特質，且「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民主」態度有顯著負向關係時，在「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此一變數受到控制的前提下，這裏所提到的「線性重合」特質，將使「個人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同樣出現顯著的負向關係，這點與發現八「具有高個人虔誠度的人，並不會比具有低個人虔誠度人更不支持民主」相抵觸。

解釋三

有一種可能性是，當解釋二中所提的「線性重合」特質僅適用在「愛好和平」此一因變數，而不適用於另一因變數「支持民主」時，「個人虔誠度」不必然與「支持民主」相關。尤其當解釋一成立時，「總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呈負相關是出自「對政府的負面態度」，而非「個人虔誠度」，則合理的推論是經濟層面的事務與「支持民主」的相關性較大，不過這股民意是依附在伊斯蘭反對運動中。也就是說，隨著執政的經驗和社會經濟狀態的波動，「支持民主」與否不必然和伊斯蘭信仰，不管在政治或宗教層面，有任何顯著的關係。[◎]由此來看，推論五的假設，即「線性重合」特質同樣適用於「個人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因果關係，顯然是一個更強烈的假設，除非得到其他新的研究支持，否則發現八在邏輯上仍然成立。[◎]

上述三個邏輯矛盾的提出和辯證，是試圖藉由釐清既有經驗研究的成果，來呈現一個較為清楚的因果關係輪廓，並作為下節論述的基礎。如先前所提，目的不在對既有研究進行否證，而是希望能對重要議題和研究架構的形成有所啟發。

肆、一個整合性論點的提出

基於上兩節的論述基礎，下面就「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和「伊斯蘭與愛好和平」兩命題，分別提出一個在「個人層次」的整合性論點，並討論其所產生的一般化理論

註◎ Clement M. Henry, "Crisis of Money and Power: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John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7~204.

註◎ 這裏所強調的是，在當今伊斯蘭社會中，人們可能將以巴問題和民主的視為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假設「線性重合」發生在「愛好和平」的態度同樣會發生在「支持民主」的態度，雖非不可能，但推論基礎太薄弱。事實上，在宗教與政治領域，在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中，以巴問題就是典型的「核心符號點」（central symbolic points），可以用來進行「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競爭，以維繫政治權力的穩定。相較之下，民主就不具像以巴問題具有那麼強的工具價值。

意含。

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因果關係推論

- 一、「個人虔誠度」與「支持民主」沒有顯著相關性。（發現八）
- 二、「對政府的負面態度」與「支持民主」呈顯著的負相關。（發現二、發現三）
- 三、「教育程度」與「支持民主」呈顯著的正相關。⑩（發現九）
- 四、出自「個人虔誠度」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民主」沒有顯著相關性。（發現七）
- 五、出自「對政府的負面態度」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民主」呈顯著的負相關。（解釋一）

六、女性由於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男性，並且在伊斯蘭社會的角色扮演上，對社會經濟事務遠較政治事務敏感，加上其所獲得政治資訊管道多來自當地社群的宗教和意見領袖（如清真寺，伊斯蘭長老，家族長輩或社區領袖等），因此其「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較多是出自「對政府的負面態度」，容易受到政治動員而感染。而「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是反映了對社會經濟情勢惡化的不滿，將希望投射在伊斯蘭反對運動，並且依附政治化的伊斯蘭主張之現象。⑪（解釋一）

七、相對地，男性的教育程度普遍高於女性，並且在伊斯蘭社會的角色扮演上，對政治事務較敏感，因此其「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較多是出自「個人虔誠度」。然而「個人虔誠度」與「支持民主」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使得男性對於民主的態度同樣取決於「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惟較多男性本身就是積極的政治參與者，並且獲取政治資訊的管道也比女性多元，所以「對政府的負面態度」所反映的，除了社會經濟情勢外，政治功效感和滿足感的低落，也是造成政治化的伊斯蘭主張得到支持

註⑩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本文至今並未提及「教育程度」此一變數在「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命題中的關係，原因在於「教育程度」對「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命題的影響，主要是第二序的作用，藉由削弱某些正向或負向的相關性，來改變「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因果關係，而非單純「教育程度」與「支持民主」的二元關係。請先參閱下面的因果關係推論，尤其是第六到第九項，然後再參考附錄四。

註⑪ Valentine M. Moghadam, *Modernizing Women: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ch. 5; R. Stephen Humphreys, *Between Memory and Desire: The Middle East in a Troubled Age*, ch. 9; Barbara F. Stowasser, "Women's Issues in Modern Islamic Thought," in Judith E. Tucker ed., *Arab Women: Old Boundaries, New Fronti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1; Fatima Mernissi, *Beyond the Veil: Male-Female Dynamics in Modern Muslim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di Nachtwey and Mark Tessler, "Explaining Women's Support for Political Islam: Contributions from Feminist Theory," in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 eds.,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4; Cherifa Bouatta and Doria Cherifati-Merabtine,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Algeria's Islamist Movement," in Valentine M. Moghadam ed., *Identity Politics and Women: Cultural Reassertions and Feminism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ch. 9.

的原因。^⑩

八、在中東政治的脈絡中，伊斯蘭信仰往往都是各方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最佳工具，當民衆由「對政府的負面態度」而產生「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時，也同時將民主貼上了負面的標籤，其具體原因有三。（i）在政治動員的過程中，反對勢力通常習於將執政者與英美帝國主義聯結在一起，因而民主成爲了外來強權的代名詞。^⑪（ii）伊斯蘭信仰本身就寓含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儘管這套秩序與民主的相容性在宗教領袖和學者間都尚無定論，但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今阿拉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都使得回歸伊斯蘭秩序，成爲相對於接受西方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之外，更具有正當性和說服力的選擇。因此，民主在此脈絡下被理解的意義與西方所認知的是不同的，許多穆斯林認爲伊斯蘭秩序就是最符合正義和民主的系統，而西方的民主反倒是墮落和腐化的象徵。^⑫（iii）許多例子顯示，當反對勢力以民主爲號召，以民主或革命手段，取得政權執政後，其執政經驗往往比之前所推翻的政權更糟，因此民衆對於民主的感受，負面評價要多過正面。^⑬

九、教育程度提高對於支持民主態度的增加不在於教育內容本身，而在於取得資訊管道的多元、判斷資訊內容自主能力的提高、傾向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思考、以及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優勢。具體來說，這些特質會減少政治動員以及印象式思考所加諸民主的負面認知，使得支持民主與否的決定比較可能是獨立思考後的結果。^⑭

總結上面的論點，本文所提出的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因果推論，可以用（圖一）來表示：

註^⑩ Mark Tessler, "The Origin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Islamist Movement: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n John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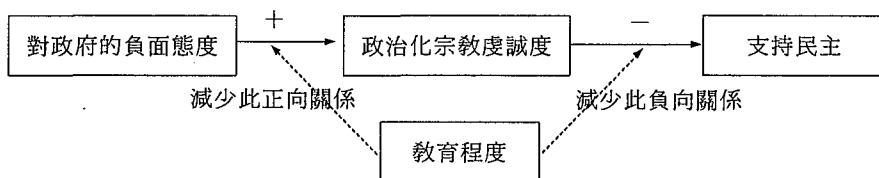
註^⑪ Jamal Al-Suwaidi, "Arab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a UAE Opinion Survey,"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5; Michael C. Hudson,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9.

註^⑫ Iliya Harik, "Pluralism in the Arab World,"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23; Shukri B. Abed, "Islam and Democracy,"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6; R. Stephen Humphreys, *Between Memory and Desire: The Middle East in a Troubled Age*, ch. 7 and 8. ("Islam as a Political System" and "Jihad and the Politics of Salvation")

註^⑬ Laurie A. Brand, "Arab Women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Howard Handelman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0), ch. 8.

註^⑭ Mark Tessler, "Morocco's Next Political Generatio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Spring 2000), pp. 1~26.

圖一 本文針對「伊斯蘭與民主」命題所提出的因果推論



如上所示，回到「伊斯蘭是否被妖魔化」的命題，表面上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態度是負向的，因為許多訴諸伊斯蘭信仰的政治主張，都以反英美帝國主義為號召，對西方自由民主傳統深具敵意。因此「妖魔化」命題是成立的，而伊斯蘭信仰的語彙、符號和過去共同的經驗，的確是政治動員上傳播反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最佳工具。但深層來看，個人對於伊斯蘭信仰的虔誠，並不會真正產生反民主的態度，而是在資訊傳遞和形塑個人政治意見的過程中，伊斯蘭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道德圖騰，吸附了所有對現況不滿和希望改革的聲音，變成政治動員的媒介。從這點看來，「妖魔化」命題是不成立的，因為真正的問題出在國內政經發展的惡化以及與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運動，伊斯蘭本身與反民主沒有必然關係。^⑧

伊斯蘭與「愛好和平」的因果關係推論

- 一、「個人虔誠度」與「愛好和平」呈顯著的負相關。（解釋二）
- 二、既有研究發現無法證實「對政府的負面態度」與「愛好和平」是否具有相關性。^⑨
- 三、「教育程度」與「愛好和平」沒有顯著相關性。（發現十）

註⑧ 如果「高教育程度」可以減少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負向關係，則意味著伊斯蘭本身與「支持民主」沒有必然關係，而是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才使這樣的負向關係成立。

註⑨ 嚴格說來，如果同時區分支持者動機和典型，其實「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和「愛好和平」的因果關係應該有下面四種可能性：（假定動機和典型皆可二分）

1. 高「個人虔誠度」→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低「愛好和平」態度
2. 高「個人虔誠度」→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低「愛好和平」態度
3. 高「對政府負面態度」→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低「愛好和平」態度
4. 高「對政府負面態度」→支持「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低「愛好和平」態度

換句話說，若僅測量男性或女性中對「伊斯蘭政治主張」的支持度，就等於將上面四種可能性不加區分混成一種。儘管發現五顯示，「個人虔誠度」與「愛好和平」沒有顯著的負相關，似乎否定了上面的前兩種可能性，而證實「對政府負面態度」的確與「愛好和平」呈負相關。但是重新檢視 Tessler and Nachtwey (1998, 631, 633)的迴歸模型，他並沒有區分支持者的典型和動機，而將四種可能的「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形態混成一「總的伊斯蘭政治主張」支持度，然後在控制「性別」、「教育程度」、「年齡」、「所得」和「經濟安全感受」之下，得出發現五的結果。在方法論上這有一個嚴重的瑕疵，也就是 Tessler 對「個人虔誠」和「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兩因變數的測量並不獨立，因此「一般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method)並不適合來推定此迴歸模型係數的估計值，而發現五的效度也大打折扣，無法當作支持「對政府負面態度」與「愛好和平」呈負相關的證據。

四、由於因變數「對以巴問題是否支持以和平手段解決」本身就是個宗教、政治、甚至某種形式的道德問題，在這個脈絡下，「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在概念界定上就有無法清楚分割的問題。但若不區分兩者，總的「宗教虔誠度」與「愛好和平」呈負相關。㊂（解釋二）

五、基於下面原因，本文提出一可能的推論。即出自「對政府的負面態度」的「政治化宗教虔誠度」與「愛好和平」沒有顯著相關性，原因在於「對政府的負面態度」往往是受到短期因素如社經情勢，或國內層次因素所影響，民意比較容易波動。而「愛好和平」所牽涉的是國際性的政治宗教問題，不是與一般日常生活切身相關之事，因此民意較穩定。除非是該國該地直接牽涉「以巴問題」，或者發生國際國內具有重大的政治宗教意涵的變化。㊃

六、性別和教育程度與「愛好和平」沒有顯著相關性的原因在於（發現四、發現十），當「以巴問題」被上綱到政治、宗教、道德、甚至是生存的問題時，沒有其他觀點能夠具有足夠正當性和說服力來挑戰主流的意見。這不代表每個人必定順從主流意見，但社會規範與政治文化的作用使得其他觀點的考量皆顯得次要。㊄

七、第六點所述，具體而言就是系統層次因素對於個人層次態度的影響。如：政體形式 (regime type)、政權的統治取向 (regime orientation)、國際情勢、歷史經驗和社會規範，可能遠比個人層次的因素來得重要。例如，就國際情勢來說，在一九九三年首次奧斯陸條約簽定後充滿前景的中東局勢，就顯然與二〇〇〇年末以巴雙方因和平進程延宕，以及現任總理夏隆 (Ariel Sharon) 參訪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共同聖地「聖殿山」所引發一連串衝突的僵持惡化局勢迥然不同；這些系統層次的變化，不但影響民意較大，同時也可能重塑某些個人層次因素的作用。㊅

八、上面論點並非否認其他個人層次因素可能對於「愛好和平」態度的影響，也不是將所有的因果關係歸因於「總的宗教虔誠度」。但過去歷史經驗顯示，「以巴問題」本質上是國內與國際層次交互連動的問題，也同屬權力政治和符號政治的場域，

註④ Mark Tessler and Ina Warriner,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rvey Data from the Middle East," pp. 277~279.

註⑤ 以巴勒斯坦為例，在 Tessler 所做的三次民調結果中，在 1994 年僅有 14 % 比例的人完全不支持非暴力方式解決以巴問題，但在 1995 年比例上升為 19 %，而 1996 年更升至 29 %，儘管沒有其它未直接涉入以巴問題國家的樣本可供對照，但可以這某種程度正反映出當事國對於情勢變化的敏感性（1993 年首次奧斯陸協議簽定後中東情勢變為和緩，但自從 1995 年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1996 年納坦雅胡接任後對以巴問題採強硬態度，都使以巴局勢日趨緊張）。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udra Grant, "Further Tests of the Women and Peace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the Middle East," p. 527.

註⑥ Souad Dajani, "Palestinian Women Under Israeli Occupation: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in Judith E. Tucker ed., *Arab Women: Old Boundaries, New Fronti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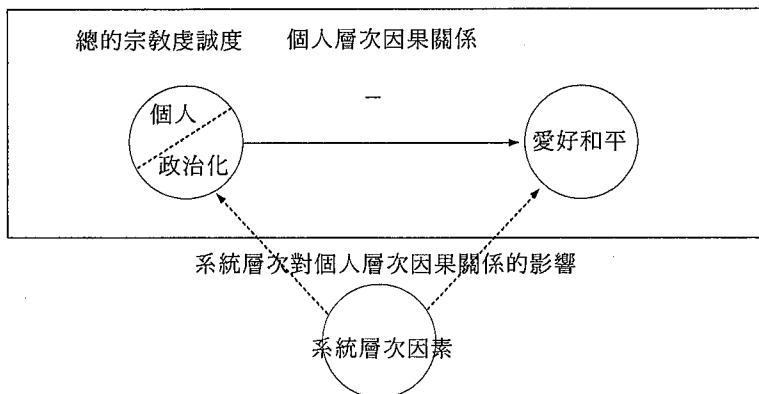
註⑦ 也就是說，以巴問題本身就是系統層次的問題，所以對民意的改變而言，國際關係因素遠較個人層次因素來得重要。

個人層次的因素要有顯著的作用，往往同時伴隨著系統層次的變化，Michael Barnett對於中東世界如何從「泛阿拉伯主義」轉換到「主權國家體系」的研究，正是其中一個例子。^④

九、更基本的問題是，用「個人虔誠度」和「愛好和平」態度的共變來推論伊斯蘭本質是否具有負面的特質，是否真的有任何意義？許多學者指出，伊斯蘭教與世界上其它宗教一樣，容許各種不同的詮釋存在，因此伊斯蘭教無本質上的好或壞，只有誰詮釋、如何詮釋、為何詮釋、及為什麼信徒相信的問題。從這點來看，除非找出誰掌握了對伊斯蘭教義的詮釋權，其如何利用宗教的詮釋權來影響「愛好和平」的態度，而信徒又因何種機制受到影響？否則僅將所有阿拉伯國家視為一體，並假設所有穆斯林對伊斯蘭信仰都有一致的認知，來論其本質的好壞，是不符現實，也是荒謬的。^⑤

上面的論點，儘管最後一點幾乎否定了先前提到的所有文獻在方法論上的正當性，但目的僅在提醒讀者這些基本問題的重要性，而非否定先前這些研究的價值。事實上本文針對「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命題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正是著重於回答這些關鍵的問題，而非陷入統計模型的迷思中。至於本文所提出的伊斯蘭與愛好和平的因果推論，可以用（圖二）來表示：

圖二 本文針對「伊斯蘭與民主」命題所提出的因果推論



* 在總的宗教虔誠度中，分隔個人和政治化的部分是虛線，代表目前在概念界定上的問題尚未解決。

如上所示，同樣就「妖魔化」命題來談，表面上目前的經驗研究證據顯示伊斯蘭的確與愛好和平呈負相關，因此可以說「妖魔化」命題是成立的，伊斯蘭教本身是「以巴問題」和平解決的一項阻力。但深層來看，在下面三項問題得到妥適的回答前，這個推論的基礎十分薄弱：一、在伊斯蘭信仰中，到底何謂個人虔誠，何謂政治化虔誠？

註④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⑤ Dale F. Eickelman and James Piscatori, *Muslim Politics*, op. cit.

在不同的教派（如遜尼派、什葉派、蘇非派或其它），不同的國家或種族中，穆斯林是如何理解和認知的？二、有那些屬於系統層次的因素，包括國家和國際層次，影響個人層次的變數，甚至是影響個人層次因果關係的結構？三、如果對於「以巴問題」的理解，在某種思考脈絡下的認知是關乎生死存亡之事，那麼傾向不支持和平手段解決就必然是道德上的瑕疵嗎？在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家為了追求生存所採取的任何手段都沒有所謂道德的標準，所以倘若個人的態度是因按照此邏輯（工具理性）所形成的，那麼還有妖魔化的問題嗎？還是這就是 Huntington 所言的「文明的衝突」，或是 Barber 以「聖戰」（Jihad）與「西方流行文化」（McWorld）所譬喻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爭？^⑥

伍、結 論

實證研究的好處在於從經驗中找尋證據，釐清理論上的因果關係，但沒有適當的理論基礎，實證研究的結果並不可靠，不能增進對於現象的理解。由此可知，兩者的關係是不斷往返的過程，而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學問，也才能在其中逐漸累積研究的成果。

本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統整過去幾年來在中東研究領域，對於「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和「伊斯蘭與愛好和平」兩命題的實證研究結果，釐清其因果關係，並解釋其中可能產生的邏輯矛盾。儘管方法論上仍有重要的根本問題尚未解決，使得本文對於兩命題的推論僅能說是具有啟發的價值，但對於形成重要的研究問題以及提供未來研究的方向來說，仍是相當具有幫助的，這點不是停留在空泛的理論層次所能夠達到的。

本文的結論之一，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負向關係，基本上是政治動員的結果。因為在國內政經社會情勢惡化的時候，伊斯蘭不但成為永遠的解決之道，也是各種不滿聲浪的匯聚之所。如此一來，各方政治勢力競相動員，在加上過去中東國家特殊的歷史經驗和政治發展過程，使得伊斯蘭和民主，成為了兩股相對抗的意識形態，但兩者之間卻未必有必然的衝突。

本文的結論之二，伊斯蘭與愛好和平的負向關係，嚴格說來，發現的問題比能夠解釋的多。因為總的宗教虔誠度和是否支持「以巴問題」以和平手段解決的態度，都會受到系統層次因素變動的巨大影響，並且這種系統層次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年間，不可謂不大。此外，更重要的問題是，伊斯蘭不是一個有嚴謹組織，並且具有全球統一之宗教權威的信仰系統，因此無所謂本質好壞的問題。最後，「以巴問題」在穆斯林理解中，到底是單純的國際政治問題，還是道德或宗教問題，則關乎在實證研究中如何在概念上界定「個人虔誠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

從上兩個結論看來，伊斯蘭可以說是被妖魔化，也可以說沒有被妖魔化。被妖魔化的原因，是從既有證據顯示伊斯蘭的確也都與反民主及反和平的態度有關；沒有被

註⑥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op. cit.

妖魔化的原因，是上述的相關性都可能出自於非宗教因素，如社會狀態，政治體制或其它系統層次變數的影響。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現今某些伊斯蘭社會中所理解的民主是不同於西方學界所認知的概念，或者所理解的「以巴問題」在本質上是不同於西方學界所理解的問題，那麼本文所提到的這些實證研究，都真的都順利克服這些不同文化和信仰系統間概念轉換的問題，並落實在問卷設計、訪談和資料詮釋的工作上了嗎？或許現階段對於這些問題的關切會比伊斯蘭是否被妖魔化的問題來的重要。

* * *

(收件：91年2月26日，修正：91年5月16日，接受：91年7月18日)



Is Islam Demonized ? An Integrated Argument from Empirical Findings

Min-hua Huang

Abstract

The debate of whether Islam is demonized has been a popular issue again since the terrorist attack on September 11, 2001. In the past, political scientists always proceeded the debate with a weak theory, with none really trying to develop a coherent on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few, and are all subject to a particular context.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little progress towards greate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seeks to integrate curren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propose a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the issue.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Islamic religiosity is inversely correlated to the pro-democratic attitudes and to the support for non-violent means of resolving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s well. While th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inverse correlation are different, religion by itself is not the prime cause, though is indeed relevant.

Keywords: Islam; Middle East Politics; religion and politics; methodology



參考文獻

- 黃曼華（2001），「『民主和平』研究的方法論評析」，《問題與研究》，40，87-107。
- Abed, S. B. (1995), "Islam and Democracy," in D. Garnham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16-13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Al-Suwaidi, J. (1995), "Arab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a UAE Opinion Survey," in D. Garnham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82-11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arber, B. R. (1995),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 Barnett, M. N. (1998), *Dialogue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uatta, C. and D. Cherifati-Merabtine (1993),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Algeria's Islamist Movement," in V. M. Moghadam (ed.), *Identity Politics and Women: Cultural Reassertions and Feminism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83-201,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Brand, L. A. (2000), "Arab Women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H. Handelman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242-261,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Dajani, S. (1993), "Palestinian Women Under Israeli Occupation: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in J. E. Tucker (ed.), *Arab Women: Old Boundaries, New Frontiers*, 102-1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Eickelman, D. F. and J. Piscatori (1996),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ntelis, J. P. (ed.) (1997),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arnham, D. and M. Tessler (eds.) (1995),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reene, W. H. (2000), *Econometric Analysis*, Upper Saddle River, NJ : Prentice-Hall.
- Harik, I. (1993), "Pluralism in the Arab World," in L. Diamond and M.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276-289,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enry, C. M. (1997), "Crisis of Money and Power: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J.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177-20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udson, M. C. (1995),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in D. Garnham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95-22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umphreys, R. S. (1999), *Between Memory and Desire: The Middle East in a Troubled Ag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Kim, J. O. and C. W. Mueller (1978), *Introduction to Factor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 Beverly Hills: Sage.
- Kim, J. O. and C. W. Mueller (1978), *Factor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Practical Issues*, Beverly Hills: Sage.
- Mernissi, F. (1987), *Beyond the Veil: Male-Female Dynamics in Modern Muslim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ghadam, V. M. (1993), *Modernizing Women: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Lynne Rienner.
- Nachtwey, J. and M. Tessler (1999), "Explaining Women's Support for Political Islam: Contributions from Feminist Theory," in M. Tessler, J. Nachtwey and A. Banda (eds.),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 48-6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towasser, B. F. (1993), "Women's Issues in Modern Islamic Thought," in J. E. Tucker (ed.), *Arab Women: Old Boundaries, New Frontiers*, 3-2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essler, M. (1997), "The Origin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Islamist Movement: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n J.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93-1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essler, M. (2000), "Morocco's Next Political Generatio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5, 1-26.
- Tessler, M. (forthcoming),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Orientations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Four Arab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 Tessler, M. and M. Grobschmidt (1995),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D. Garnham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35-16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essler, M. and I. Warriner (1997),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rvey Data from the Middle East," *World Politics*, 49, 250-281.

Tessler, M. and J. Nachtwey (1998), "Isla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 619-636.

Tessler, M., J. Nachtwey, and A. Grant (1999), "Further Tests of the Women and Peace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519-531.



附錄一 資料說明

研究範疇 發現	出處	研究區域、時間	統計資料處理方式	其他例證
發現一	Nachtwey and Tessler (1999, p.61)	埃及(1988), 科威特(1988), 巴勒斯坦(1995), 摩洛哥(1996~1997)	百分比	
發現二	Nachtwey and Tessler (1999, p.62)	埃及(1988), 科威特(1988), 巴勒斯坦(1995), 摩洛哥(1996~1997)	列聯表分析 (Contingency table analysis)	
發現三	Al-Suwaidi (1995, p.9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991)	交叉列表(cross-tabulation)	
發現四	Tessler and Nachtwey (1998, pp.631~632)	埃及(1988), 科威特(1988), 巴勒斯坦(1995), 約旦(1994), 黎巴嫩(1994)	因素分析、多變量迴歸分析	Tessler, Nachtwey and Grant (1999), Tessler and Warriner (1997)
發現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Tessler and Warriner (1997), Tessler and Grobschmidt (1995)-「個人虔誠」與「支持和平」呈正相關
發現六	Tessler and Warriner (1997, p.277~279)	以色列(1989), 埃及(1988), 科威特(1988), 巴勒斯坦(1994)	因素分析、多變量迴歸分析	
發現七	Tessler (forthcoming)	巴勒斯坦(1995), 摩洛哥(1995~6), 阿爾及利亞(1995~6), 埃及(1988, 1992)	多變量迴歸分析	
發現八	Tessler (manuscript, pp. 12~13, 16)	摩洛哥(1995~6), 阿爾及利亞(1995~6)	多變量迴歸分析	
發現九	同發現七、發現八			Tessler (2000)
發現十	同發現五			Tessler and Warriner (1997)

附錄二

文獻出處 (按字母排列)

Al-Suwaidi (1995) – Jamal Al-Suwaidi, “Arab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a UAE Opinion Survey,”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5.

Nachtwey and Tessler (1999) – Jodi Nachtwey and Mark Tessler, “Explaining Women’s Support for Political Islam: Contributions from Feminist Theory,” in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 eds.,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4.

Tessler and Grobschmidt (1995) – Mark Tessler and Marilyn Grobschmidt,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David Garnham and Mark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7.

Tessler and Nachtwey (1998) – Mark Tessler and Jodi Nachtwey, “Isla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5 (Oct 1998), pp. 619 ~ 636.

Tessler, Nachtwey and Grant (1999) –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udra Grant, “Further Tests of the Women and Peace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 1999), pp. 519 ~ 531.

Tessler and Warriner (1997) – Mark Tessler and Ina Warriner,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rvey Data from the Middle East,”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 1997), pp. 250 ~ 281.

Tessler (2000)-Mark Tessler, “Morocco’s Next Political Generatio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Spring 2000), pp. 1 ~ 26.

Tessler (forthcoming) – Mark Tessler,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Orientations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Four Arab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forthcoming).

Tessler (manuscript) – Mark Tessler, “Prospects For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Values in Arab Non-Democracies: Evidence From Morocco and Algeria,” (manuscript).

附錄三

推論二的證明

令男性和女性各有 K % 的比例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發現一），在男性中，支持者典型是「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占 X %，而「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占 (K-X) %，在女性中，支持者典型是「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占 Y %，「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占了 (K-Y) %。

假定「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可簡化成支持和不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根據發現三，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者其「支持民主」的態度較低，又在未知有其他因素可能減低的「支持民主」態度的情況下，這裏僅能就「政治化宗教虔誠度」會減低「支持民主」態度的部分來談。由此可知，在男女兩性中，不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那 (100-K) % 人口具有較高「支持民主」的態度，假設平均值是 a。

在發現七中，女性「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與「支持民主」呈負相關，而男性無此相關性。由此可得 (i) 女性中這 (K-Y) % 的人確知是具有較低的「支持民主」態度 (ii) 男性中這 (K-X) % 的人與其他不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人在「支持民主」態度上並無不同。因此整體來說，女性人口中對於「支持民主」態度偏低的人口是 $\{(K-Y)\% + Y\%\}$ ，其中 (K-Y) % 是確知的，Y % 則有待驗證；其它 (100-K) % 的人口「支持民主」態度的平均值是 a。而男性人口中對於「支持民主」態度偏低的人口是 X %，並且有待驗證；而其它 (100-X) % 的人口「支持民主」態度的平均值是 a。

然而從發現七的另一結論來看，男女兩性在「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與「支持民主」態度並沒有顯著負相關，因此男性人口中剩下的 X % 也與其它 (100-X) % 的人一樣，至少就平均值而言，具有相同「支持民主」的態度。至於女性的部分，同樣地 Y % 的人必須視作與其它 (100-K) % 的人口具有相同「支持民主」態度的平均值。

進一步分析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的動機，在女性已知對於「支持民主」態度偏低的 (K-Y) % 人口中，有兩類族群。一是她們出自「高個人虔誠度」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進而有較低的「支持民主」態度，二是她們出自「對政府負面態度」支持「伊斯蘭政治主張」進而有較低的「支持民主」態度，這兩種可能性都無法在已知的條件下排除。

假定女性這 (K-Y) % 具有較低「支持民主」態度的平均值是 b，且 $b < a$ 必然為真，則

男性總的「支持民主」態度平均值是 a

女性是 $\{(100-K+Y) \times a + (K-Y) \times b\} < \{(100-K+Y) \times a + (K-Y) \times a\}$ ，也就是小於 a
所以女性總的「支持民主」態度平均值小於男性，得證。

附錄四

教育程度在「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命題的因果推論說明

問題：如果附錄三的論證是正確的話，對於男性而言，「個人虔誠」，「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及「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全都與「支持民主」沒有負向相關，那麼似乎整個推論的架構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作者所提的一些特定變因，幾乎都在推論二的論證中證明與因變數是無關的。

這點正是作者綜括和理解現有經驗研究成果之後認為不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細看 Tessler 的統計結果（*forthcoming* 一文的附錄），他發現教育程度對於男性以及全體不分性別的樣本而言，是與「支持民主」呈顯著的正相關；而在女性的樣本中，同樣關係在某些國家是顯著的，在某些國家則否。這可能意味著教育程度對於支持民主態度的影響頗大，因為熟知中東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中東國家，雖然男性的識字率和平均教育程度不高，但女性的識字率和平均教育程度事實上更低，這個統計結果有可能是因為女性的樣本中缺乏足夠「高教育程度」屬性所得出的結果，而至於男性，因為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此一因素對於「支持民主」的影響抵消了在女性樣本中所推論的因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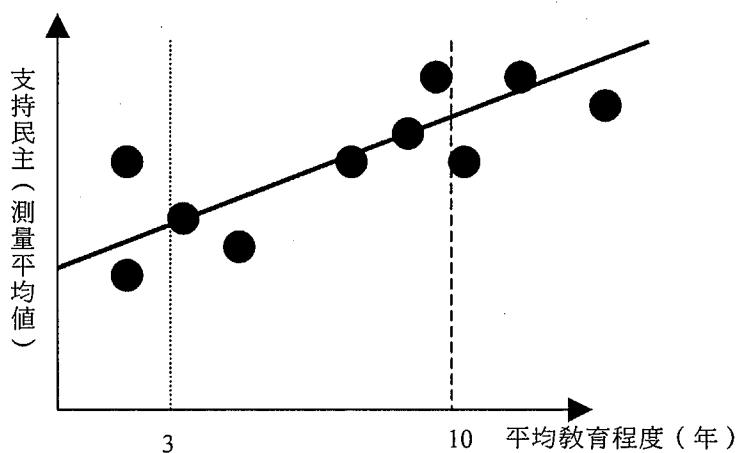
檢視正文（圖一）所提「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命題的因果推論，男女兩性在此因果架構下首要的差異在於「教育程度」，如果此推論是對的話，儘管沒有證據可以確定在什麼水準之下的教育程度（類似門檻的概念）可以降低「對政府負面態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的正向關係，以及「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民主」的負向關係，但較高的教育程度可使上述兩因果關係變得不顯著的推論是合理的，這也是為什麼在男性樣本中，「個人虔誠」，「接受伊斯蘭教義對政治事務的導引」，及「接受伊斯蘭教義對經濟事務的導引」全都與「支持民主」沒有負向相關的可能原因。

就女性而言，依上述推論，由於平均教育程度較低，且多數人集中在低教育程度的群集中（比方說可能 80 % 的女性只有不到四年教育，而其餘 20 % 則散布在四到十六年的教育程度），因此迴歸分析的結果並不能真正顯示「教育程度」可能所具有的影響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對政府負面態度」和「政治化宗教虔誠度」的正向關係，以及「政治化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民主」的負向關係而言，兩者都是可能的合理推論（如正文第四節對伊斯蘭與支持民主因果關係的推論）。

關於上述的解釋，可以用三個迴歸關係圖來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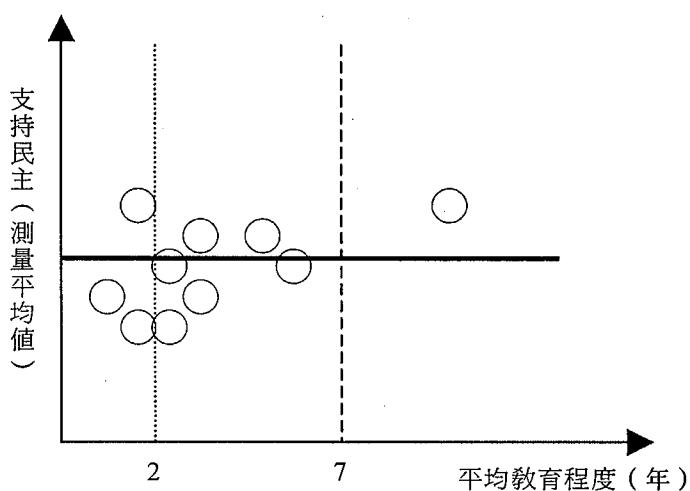
假定男性的教育程度可分成兩群集，有 40% 是在 4 年以下，平均值是 3 年；另 60% 是在 4 年以上，平均值是 10 年。若進一步簡化，將 10% 的人口當作一單位，依序從低教育程度到高教育程度，取其測量平均值，則可將所有的男性人口其教育程度和支持民主態度的關係，以十個點表示出來，如（圖三）。

圖三 男性人口中教育程度與支持民主之關係
(顯著正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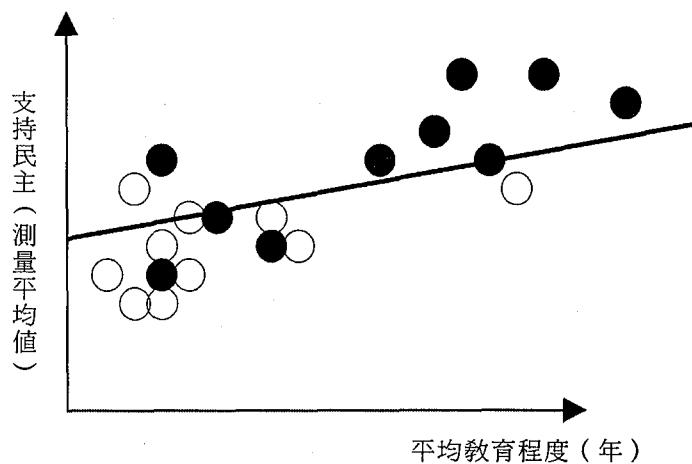
假定女性的教育程度可分成兩群集，有 70 % 是在 4 年以下，平均值是 2 年；另 30 % 是在 4 年以上，平均值是 7 年。若依上圖方式簡化，結果如（圖四）。

圖四 女性人口中教育程度與支持民主之關係
(沒有顯著相關性)



若將上兩圖合併，假定男女人口數相同，可得（圖五）。

圖五 全體人口中教育程度與支持民主之關係
(微弱正相關)



問題出在，在女性人口中，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樣本過少，如果教育程度此一變數在超過某種門檻具有對其它因果關係具有交互影響的特質，那麼女性和男性在伊斯蘭與支持民主的命題上有不同的因果關係推論是合理的。因為男性樣本的平均教育程度已超過門檻，而女性則遠低於門檻。